

#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地区移民 对河西文化的影响

◎齐晓芳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上海 200000)

【摘要】魏晋时期河西两次大的移民对当时该地区的文化影响是意义非凡的，第一次中原人口迁入河西移民促进了河西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其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而第二次河西世族羯泽式的迁出却是河西文化灾难性的打击，从此河西儒学文化一蹶不振，而佛教文化在此期间却兴盛发展，达到一个高峰。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河西地区；移民；河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02-0046-03

所谓移民，便是指人口迁徙，有迁入与迁出，有主动与被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是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根据移民的特征，重要划分为政治性移民、军事性移民和经济性移民。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方式各不相同，背景各有所异，甚至动机也各自有其复杂性。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移民，都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稳定和巩固国家政权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有三次，第一次大移民是从晋怀帝永嘉年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第二次是唐中叶安史之乱后中原汉族的南迁，第三次是北宋靖康之乱后汉人的南迁。

## 一、河西地区第一次移民

其中魏晋时期发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对当时的迁入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291年的“八王之乱”造成的大规模中原战争和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后中原大乱，大量的中原人口南下，导致大规模北人南迁。但与此同时，由于河西走廊远离中原战场，社会长期保持相对安定的状态，而且当地的地理条件也比较适合农业生产与开发，所生产的粮食也足以养活大批的移民人口<sup>①</sup>，因此部分中原人口迁入河西地区，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移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晋书》中载：“及京都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sup>②</sup>，时经营凉州的张轨“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sup>③</sup>，侨置郡县，安置移民。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讲到：“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与凉州一隅”<sup>④</sup>，

“秦凉诸州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绵延一脉”<sup>⑤</sup>。陈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河西地区自张轨之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平稳发展，虽然地处西北边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在所难免，但相比于中原等经常经历战乱之地，河西地区还是相对安稳，所以该地区成为中原人士的避难之地；第二，魏晋以来，儒学重心主要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学术大多在家族内传承。即使中原地区战火不断，而边陲之地尚能保持和平的秩序，家族的学术得以传承。这样本土世家的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的儒士也可传授学术。因此，河西地区文化的繁荣是在河西原本的文化基础上加之中原文化传入两方面的作用下而发展形成的，这一时期，河西学术文化得到了良性发展。

有了陈寅恪的说法之后，许多学者对这一说法逐渐靠拢，对于河西文化的作用都认为非常重要。葛剑雄也说“汉人西迁的人数虽不及南迁，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并不在南迁移民之下”<sup>⑥</sup>。

## 二、河西地区第二次移民

河西地区第二次移民是公元439年，北魏破姑臧，灭北凉，使河陇士族大量迁出。《魏书》中载：“（太延五年）八月甲午，永昌王健获牧犍牛马畜产二十余万。牧犍遣弟董来率万余人拒战于城南，忘尘退走。丙申，车驾至姑臧，牧犍兄子祖踰城来降，乃分军围之。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投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

珍宝不可称计……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sup>⑦</sup>。在这其中还包括许多河西地区的世家大族，如敦煌索敞、张湛，武威段承根等。这两次移民对河西地区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掌握学术重心的世家大族迁入与迁出，是造成河西文化一时繁荣后很快让位与佛教文化的重要因素。

李智君却认为这种有意无意地夸大中原移民对河陇学术的影响是一种对陈寅恪所言的一种误解。他认为“河陇地区拥有的学术文化本来就是转移来的，对河陇学术和文化的发展并无大碍，转移来的人口对河西文化的发展有促进，但根本原因还是自汉武帝以来大力经营西北，使这一时期有长期的学术文化的积累”<sup>⑧</sup>，再加上五凉时期在河西地区的各个政权为了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立足，大力招揽人才，重视学术教育，使得在这片相对安定的土地上，学术文化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这才在这一纷争时期河西文化得以繁荣发展，中原人口的迁入并不是直接导致文化繁荣的原因，陈寅恪所言“文化转移”乃是文化重心的转移，并非文化本身的转移。李智君认为北魏时期河西士人的迁出却对河西文化的发展打击较大<sup>⑨</sup>，这次移民是在国家政权的强制作用下进行的，许多河西地区的世家大族被连根拔起。而且许多儒士被迫迁往平城后，境遇并不如意。如索敞至平城后任“中书博士，任教十余年，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sup>⑩</sup>；又如张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sup>⑪</sup>，曾任北凉黄门侍郎、兵部尚书；迁入平城后，常与崔浩讨论《易》经，备受重视；再如段承根被太武帝当做上宾，经崔浩推荐为著书郎，参与编修国史，后因被人告发企图南逃被杀<sup>⑫</sup>。其他一同迁入平城的河西学者，大都境遇一般，郁郁不得志，甚至还有继续迁往他处的学者。因此，李智君认为陈寅恪所谓河陇文化“下开魏齐隋唐之制”的说法未免是夸大了河陇学者对迁入地平城的文化影响。

### 三、移民期间河西佛教文化兴盛的原因

北魏时期，在政府的强制之下，河西世家大族中有大量儒学精英迁往北魏都城平城，这种竭泽式的迁移导致了河西文化发展的突然不平衡。一方面使得河西地区延续了几百年的学术基础被打破，另一方面北魏统治者通过此次移民达到铲除盘踞在河陇的世家大族的目的；再加上河西地区地理位置偏僻，为中原王朝的边境之地，经常面临与西部和北部少数民族的冲突，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河西学术蓬勃发展的现象。这一时期大量的文化精英的迁出，对河西学术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再加上社会动荡不安，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将信仰寄托于宗教，在儒学和佛学的较量中，佛教文化在整个凉州文化中比重逐渐上升。因此，这一时期河西地区佛教文明的不断发展与河西的移民活

动和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河西第一次移民发生时社会极度动荡不安，西晋王朝先后经历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整个中原大地陷入纷纷战火中，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在被迫迁往相对安定的南方和西部，这样的乱世本身就为佛教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社会基础。对统治阶级来说，乱世的福祸不定和生死无常，他们通过信仰佛教崇佛，以祈求神灵保佑。另外，统治阶级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加强统治。在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在河西称王、建立政权后，希望获得一种根据为自己的政权找到合理性，于是他们转向佛教。如后凉的吕光迎高僧鸠摩罗什到凉州居留，翻译佛经，传播佛教；北凉的统治者迎请天竺名僧昙无讖到姑臧，并同河西沙门惠嵩、道朗等合作翻译佛经并积极进行传播佛教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后来河西地区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普通百姓在当时纷乱的社会环境中，更是灾难深重，为求得精神寄托，便转而信奉佛教。同时，“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邑，以奉其神，其汉人不得出家”<sup>⑬</sup>的禁令已被打破，佛教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传播开来。

其次，尽管这一时期战火纷争不断，但河西地区相对安定，这样的局面又为佛教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时有民谣说“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sup>⑭</sup>，在张轨、张骏、张重华统治时期，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惠农政策；在西凉李暠统治期间，出现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北凉沮渠蒙逊统治时政治清明，经济也不断发展，所以“秦雍之民死者十八九，唯凉州独全”<sup>⑮</sup>，“避难之国，唯凉土耳”<sup>⑯</sup>。因此，来此躲避战乱的中原人口也逐渐增多。河西的社会安定和人口的逐渐增加为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河西经济的不断繁荣，也为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修建寺院、刊行佛经、开凿石窟等活动逐渐多了起来。

第三，河西佛教文化的兴盛离不开五凉统治者在经营河西地区时加紧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河西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与西域地区在血缘、语言、文化方面本身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各民族政权加紧与西域地区的沟通，使西域与河西的交往通畅，促进河西商业贸易的繁荣，来往的僧人也更加方便，直接推动了河西佛教的发展。

第四，北魏时期河西世族的迁出给佛教的发展提供的空间。从学术传承方面来看，士人的东迁不仅使河西五百多年的学术积累遭到破坏，学术家族的离去，也为日后河陇学术逐渐衰落埋下隐患，河陇学术全面繁荣的局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香火繁盛的佛陀世界，因此，这一时期该地区佛教文化达到一个繁荣的景象。

### 四、河西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

佛教文化本是公元前六世纪由释迦牟尼创立，经过

几个世纪的发展,在两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佛教文化经过中亚地区、西域地区传入中原。而河西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线,较早地接触到佛教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河西地区大量移民的迁入与迁出,为佛教文化提供了发展空间,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此时的河西佛教的发展已成为北方佛教发展的代表,佛教的兴盛也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开窟建寺非常频繁,这也是佛教活动的标志。佛教信徒的主要功课之一便是坐禅,即在石窟中静坐苦修,而石窟也一般修建在远离闹市的右山僻林之地。河西地区现存石窟的数量,在全国是少有的。著名的莫高窟便开始开凿于前凉时期。《大周李君莫高窟佛龕碑》是现存最早记载关于始开莫高窟的文字史料,该碑立于武周圣历元年(698),碑文中记载道:“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傅,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傅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sup>⑩</sup>魏晋南北朝以后各代依此风气,至唐代达到了鼎盛,现今莫高窟保存下来有492窟,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凿的就有四十多窟。除莫高窟外,河西地区的石窟还有敦煌西千佛洞、榆林石窟,玉门昌马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和武威的天梯山石窟。

其次,翻译经文相当兴盛。佛教在此期间流行广泛,出现众多名僧,留下数量可观的经文。译经僧人有鸠摩罗什、道安、法众、僧伽佉、昙无讖、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宝云、法盛、僧表等。前凉时期建立官方译场,北凉沮渠氏尊崇佛法,志在弘扬,便广引众僧,翻译经论。庞大的译经数目便可证明北凉译经的发达,有记载曰:“于中二十五部二百九卷见在,五十七部一百二卷阙本”<sup>⑪</sup>。公元425年,在姑臧城,北凉沮渠牧犍组织了一次三百人的大型译经活动,译浮陀跋摩的《大毗婆沙》,译者“考文详义,务存本旨”,至439年,译出这部长达100卷的经典。河西佛教译经的规模之大,大量经文的翻译和传抄流行,对佛教的繁荣又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还表现在说唱艺术的盛行。说唱艺术作为俗文学的一种形式,在民间极为流行,而大量的佛教故事以变文的形式流传。如《太子成道经》《大目乾莲冥间救母变文》等,都是追求佛家最高理想和佛法战胜邪道的故事,且文笔生动,在民间是非常有效的弘扬佛法的艺术形式。

总言之,魏晋时期河西两次大的移民对当时该地区的文化影响是意义非凡的,第一次中原人口迁入河西移民促进了河西文化的繁荣发展,使其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高

度;而第二次河西世族竭泽式的迁出却是河西文化灾难性的打击,从此河西文化一蹶不振,儒学让位于佛学,在河西佛教兴盛发展的同时,河西学术再也没有往日的辉煌,佛教文化却在此期间达到发展高峰。河西地区佛教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互渗透,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展,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 注释:

①葛剑雄:《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及文化意义》,《葛剑雄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451页。

②(唐)房玄龄等:《晋书·张轨传》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5页。

③(唐)房玄龄等:《晋书·张轨传》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5页。

④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页。

⑤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6-47页。

⑥葛剑雄:《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及文化意义》,《葛剑雄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451页。

⑦(北齐)魏收撰:《魏书·世祖纪》卷四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0页。

⑧⑨李智君:《五凉时期的移民与河陇学术的盛衰——兼论陈寅恪“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说》,《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67-84页。

⑩(北齐)魏收撰:《魏书·索敞传》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62-1163页。

⑪(北齐)魏收撰:《魏书·张湛传》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53-1154页。

⑫(北齐)魏收撰:《魏书·段承根传》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58页。

⑬(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九《晋邺中竺佛图澄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2页。

⑭(清)张澍:《凉州府志备考(下)》武威市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版,第61页。

⑮(北齐)魏收撰:《魏书·私署凉州牧张寔传》卷九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58页。

⑯(唐)房玄龄等:《晋书·张轨传》卷八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26页。

⑰(清)徐松著,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9-150页。

⑱(唐)智升撰:《开元释教录》,《大正藏》第55册2154号,第519页。